

天津图书馆藏抄本《析津志》的四库学考察*

邱靖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从四库学的视角,对《析津志辑佚》曾利用过的清末徐维则铸学斋原藏《析津志》抄本进行了专题研究。此书现藏于天津图书馆,系清四库馆臣《永乐大典》辑佚稿本,很可能是专为纂修《钦定日下旧闻考》而誊抄精校的一个本子。藉此,可了解《钦定日下旧闻考》纂修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及对《大典》辑佚、文字讳改等相关四库学问题的思考。此外,查阅该书原本亦可校正《析津志辑佚》中的若干讹误。

关键词:《析津志》 《永乐大典》 《钦定日下旧闻考》 四库学

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原名《析津志典》)是第一部系统记述北京地区历史的方志学著作,对于北京史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然而此书纂成时仅有稿本传世,明初被编入《永乐大典》,大约至明代中叶以后失传^①,其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直至清高宗修《四库全书》始从《永乐大典》内辑出《析津志》佚文,清末光绪间缪荃孙又将《永乐大典》所收“顺天府”条目下之内容抄出,题为《顺天府志》,其中亦摘录了部分《析津志》文字,使学界得以了解该书的具体内容。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在赵万里先生的主持下,开始了《永乐大典》残本的辑佚工作,先后共辑出包括《析津志》在内的二百零八种佚书稿本。六十年代,赵万里先生曾有计划对《析津志》进行校注^②,惜未成书。八十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重启《析津志》辑佚和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研究——‘华夏型’城市的历史变迁”(16ZDA120)阶段性成果。

①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卷一八“来”字号第一橱书目尚著录有《析津志典》三十四册(《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嘉庆四年顾修辑刊《读画斋丛书》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4册,第180页),万历中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已无此书,至明末清初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时,则将此书列于卷八地理类下存目之中(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②参见赵芳瑛、赵深编:《赵万里先生传略》,《赵万里文集》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整理工作,终于1983年出版了《析津志辑佚》一书,将现存《析津志》佚文几乎搜罗殆尽,并做了初步的文字校勘,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析津志》版本^①。

关于这部《析津志》,此前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该书作者及其成书过程的钩稽考索^②,《析津志辑佚》问世后,又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个整理本进行过若干辨误补遗^③。不过,笔者注意到,《析津志辑佚》交代其资料来源时,提到过一个清代《析津志》抄本,对于这个本子研究者关注不多。此抄本原为清末绍兴藏书家徐维则铸学斋所有,其今藏地书目著录有些蹊跷,或云北京图书馆,或云天津图书馆。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析津志》一书早已散佚,那么这部所谓的《析津志》抄本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又经历了怎样的流传过程?这些都是有关此书的基本问题,而前辈学者却并没有对此予以深究,更未充分揭示此书的文献价值。实际上,据笔者管见,这部《析津志》抄本实乃清乾隆中四库馆臣《永乐大典》辑佚的产物,且与官修《钦定四库全书》密切相关,值得我们从四库学的视角,对该书做一番仔细的考察。

一、天津图书馆藏《析津志》抄本

李致忠先生在《析津志辑佚》书前“整理说明”中提到,当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辑录《析津志》佚文,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清徐维则铸学斋藏抄本,并对此本情况做了简要介绍。该抄本书后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徐维则跋,其跋文称此书原为山阴李宏信小李山房插架之物,后归同邑孙沂,最后转归徐氏铸学斋,因书中载有一篇《宪台通纪》序文,故李宏信手题书名为《宪台通纪》,但徐维则根据其他内容判断此书绝非元代政书《宪台通纪》,由于书中有一则明洪武三年(1370)颁行府学格式的记载,故疑此“似系明初人辑元都掌故之书”,后为《永乐大典》所收录,并指出“书内有签校《大典》数条”。李致忠先生对于该抄本究竟为何书的看法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仍沿袭徐维则之说,认为此

①李致忠:《析津志辑佚》“整理说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此文后改题为《析津志与析津志辑佚》,收入氏著《肩朴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92—403页。

②谢国桢:《评介北京最早的一部志书〈析津志〉》,北京史研究会编《燕京春秋》,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34—244页;赵其昌:《〈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辑,首都博物馆丛刊编辑委员会,1982年,第55—70页;王灿炽:《谈〈析津志〉的作者熊梦祥》,《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北京史研究会,1982年,第178—184页,又见同氏《熊自得与〈析津志〉》,《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121—125页。

③如党宝海:《〈析津志〉佚文的新发现》,《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114—117页;孙立慧:《〈析津志辑佚〉中的有关问题》,《文献》2006年第4期,第105—112页;尚衍斌:《也谈〈析津志辑佚〉中的有关问题》,《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2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200页;刘晖:《〈析津志辑佚〉订误》,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确似明初人辑元都掌故”；另一方面又因书中有校《大典》的签条，而怀疑“此书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该书中确实包含着大量《析津志》的内容^①。今从《析津志辑佚》所标明的各条记载出处来看，有大约一半以上的内容即源自于这部铸学斋藏抄本《析津志》。

关于这一《析津志》抄本的收藏机构，李致忠先生在文中并未明确交代，不过从上下文来看，似乎给人一种此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印象。在某些书目中，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著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介绍有关《析津志》的版本情况称：“北京图书馆藏有三十年代辑录的《析津志》稿本一册及《析津志》抄本二册（旧题《宪台通纪》，误）。 ”^②其中，所谓“《析津志》稿本”是指当年北平图书馆工作人员直接从《永乐大典》残本中辑录出来的《析津志》佚文，编为一册。而所谓原误题为《宪台通纪》的《析津志》抄本二册，应当就是李致忠先生提到的那部徐维则铸学斋藏本。近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也著录《析津志》有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本和抄本二种，均藏于国家图书馆^③。前者即《析津志》民国辑佚稿本，后者亦指徐维则铸学斋原藏抄本。

除以上书目的简单著录外，首都博物馆原馆长赵其昌先生还说道，上世纪五十年代，首博曾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借抄了上述两个《析津志》版本。其《〈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一文云：“首都博物馆藏抄本《析津志》三册：一册题名《辑本析津志》，另二册题名《析津志》第一册、第二册。这三册是1954年从北京图书馆藏本转抄的，原书也是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另二册首页均有印章‘述史楼’、‘维则所得善本’；书后印章为‘会稽徐氏铸学斋藏书印’。下册后又有徐维则跋文二则，并有小印章‘会稽徐氏’等。从跋文看，二册题名《析津志》还是后来的事，从前不叫《析津志》，而是题名《宪台通纪》。”^④赵其昌先生对徐维则铸学斋藏本《析津志》的钤印情况及跋文内容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并明确称此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①李致忠：《析津志辑佚》“整理说明”，第10—11页。

②金恩辉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之《析津志》提要，台北·纽约·洛杉矶：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1—5页。据书前“凡例”，该书所收地方志基本上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依据，如现存地方志与《联合目录》所载有出入，以核实后的为准（第1页）。查《联合目录》，著录《析津志》亦有两种，一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民国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另一种抄本则藏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资料室（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大概后经《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编纂者核实，这两种抄本实均藏于北京图书馆。

③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方志类地志之属，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册，第4072页。

④赵其昌：《〈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首都博物馆丛刊》第1辑，第56—57页。下文转录有徐维则跋文二则。

根据上述这些信息,这部徐维则铸学斋藏本《析津志》今度藏于国家图书馆,似乎是确定无疑的。然而笔者查阅《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均无此书,在国图的馆藏目录检索系统中也未能找到相关检索信息。后笔者就此《析津志》抄本的下落问题请教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李坚研究员,承李坚老师代为查找,方知此书今仍著录为《宪台通纪》,原书现藏天津图书馆,见于天图的书目检索系统,国图仅有1989年复制的胶卷,且不对外开放阅览。笔者遂检阅《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果然查到了此书的著录信息:“《宪台通纪》不分卷,清抄本,清徐维则跋,二册,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钤‘会稽徐氏铸学斋藏书印’(朱文方印),‘述史楼’(朱文长方印),‘维则所得善本’(朱文方印)。”^①从这一版本介绍来看,此《宪台通纪》应该就是李致忠与赵其昌先生所说的那部徐维则铸学斋藏本《析津志》。

得知这一线索后,蒙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陈红彦主任及天津图书馆古籍部李国庆主任的大力帮助,笔者终于在天图见到了这部题为《宪台通纪》的珍本原书^②。此书共1函2册,书衣皆无题名,全书不分卷,每半叶8行21字,白口红格,四周双边,无鱼尾。第一册首叶天头处钤有“直隶(省教育厅)检查图书(书之章)”朱文大方印之半,首栏题“古迹”,从上到下依次钤有“善本鉴定”、“天津图书馆藏”、“述史楼”、“天津特别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之章”及“维则所得善本”五方印鉴,第二册首栏题“析津志”,钤印大略相同,两册末叶还有“会稽徐氏”、“会稽徐氏铸学斋藏书印”等印。第二册卷末另纸书有徐维则跋文二则。据笔者目验,此即《析津志辑佚》曾利用过的徐维则铸学斋藏《析津志》抄本无疑,旧题《宪台通纪》乃是沿袭前人之误。

那么,此书是何时入藏天津图书馆的呢?这从馆方题签及所钤印鉴亦可作出大致判断。该书函套内有天图题签,称此书来源系“本馆自购”。另上节提到,该书第一册卷首有“直隶省教育厅检查图书之章”及“天津特别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之章”二印。天津图书馆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名直隶图书馆,民国间屡有更名,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天津,1938年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第二图书馆”,至抗战胜利后又改为“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③。可见这部《析津志》抄本早在抗战时期即已归于天图,而所谓“直隶省教育厅”的检查图书之章表明其入藏年代更早。清末于各省设提学司,由提学使掌管全

①天津图书馆编:《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政书类亦称“《宪台通纪》不分卷,清抄本,徐维则跋”,藏于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线装书局,2005年,第641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收此书),即今天津图书馆。

②索书号为S2803,可查天津图书馆在线书目检索系统。其检索结果称此书“书名依旧题,据徐维则考证此书难定为何书”。

③天津市图书馆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市图书馆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省教育工作,民国建立后改为教育司,1917年又改为教育厅^①,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直隶改为河北省,原行政机构随之解散。由此看来,《析津志》抄本很可能在直隶省教育厅成立之前即已为当时的直隶图书馆所收藏,故得以钤盖“直隶省教育厅检查图书之章”。而在1917年之前,直隶图书馆大规模采购书籍乃是在清末傅增湘任提学使期间。适时,直隶图书馆初创,馆藏图书始由天津名流严修及奉天总督徐世昌等捐赠,傅增湘“在提学使任复购十二万馀卷”^②,使其藏书大为扩充^③。这部所谓“本馆自购”的《析津志》抄本或即傅增湘替直隶图书馆所购众多书籍之一,后直隶省教育厅巡查馆藏图书,遂加盖专章^④。

由以上论述可知,徐维则铸学斋藏《析津志》抄本很可能自清末民国以后便一直保存于天津图书馆,那么《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等书目又为何会将其今藏地著录为北京图书馆呢?这牵涉到对于此书内容的认定以及藏本流传问题,需要首先从其来历说起。

二、《析津志》抄本的来历

有关这部天图藏《析津志》抄本的由来及其内容,最为重要的文字记载就是书后两则徐维则跋文(见图1),现转录于下,以备讨论。

右书二册,山阴李柯溪吏目宏信小李山房藏本,后归同邑孙古徐先生沂小青楼者也。旧于首题《宪台通纪》,为柯溪先生手笔,装修时为鼠剥去。按《宪台通纪》元人赵承禧、潘迪各有其书,载在《元史艺文志》。(小注:赵书一卷,潘书二十三卷,又有唐维明续集一卷。书中载赵承禧奉敕撰,《宪台通纪》成书实二十四卷,足以证《元志》之误。)是书现存古迹、岁纪、祠祀、析津、风俗、学校诸门,又有朝仪、祭祀、迎驾、岁仪、驾回、舆地诸

①李建勋:《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邵爽秋等编:《教育参考资料选辑》第二种《教育行政之理论与实际》,上海:教育编译馆印行,1935年,第2—3页;1917年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厅暂行条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4—135页。

②傅增湘:《天津直隶图书馆书目叙》,民国二年(1913)天津直隶图书馆铅印本《天津图书馆书目》卷首,叶1a。

③谭新嘉《天津图书馆书目跋》云:“江安傅公博学好聚书,谓天津为北洋冲要之区,非力加扩充于教育补助机关不无阙憾,乃筹集巨款,广为搜罗,于是馆中藏弃古今典籍多至二十万卷有奇。”(叶1a—1b)

④有学者也曾提到,天津图书馆藏万斯同《万季野先生四明讲义》亦钤有“直隶省教育厅检查图书之章”、“天津特别市立第二图书馆藏书之章”等印,“据该馆有关专家推测,此书或为清末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时购入天津的”(朱端强:《万斯同史学讲话初探——读〈万季野先生四明讲义〉》,《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情况与天图藏《析津志》抄本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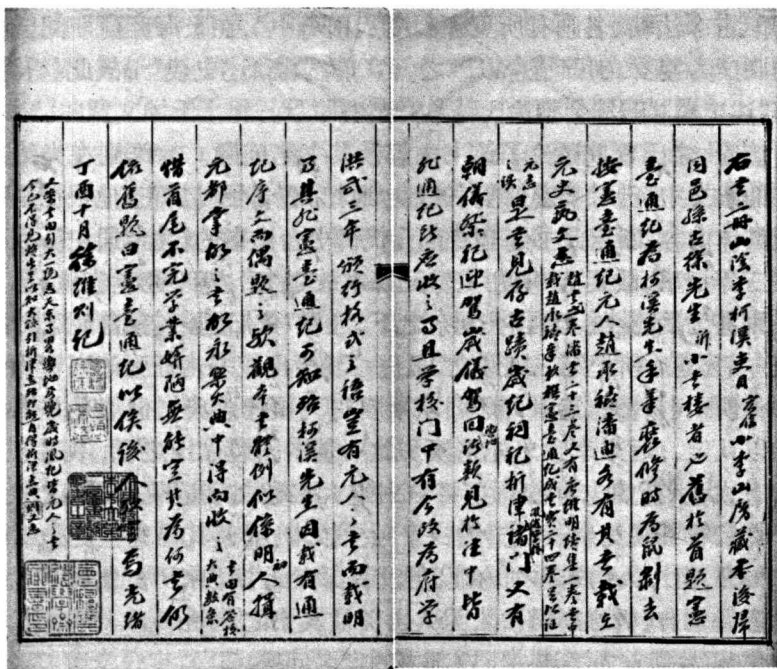


图1 徐维则跋文

类见于注中,皆非《通纪》所应收之事,且学校门中有今改为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之语,岂有元人之书而载明事?其非《宪台通纪》可知,殆柯溪先生因载有《通纪》序文而偶题之欤。观本书体例似系明初人辑元都掌故之书,故《永乐大典》中得而收之。(小注:考内有签校《大典》数条。)惜首尾不完,学业舛陋,无能定其为何书,似依旧题曰《宪台通纪》,以俟后人考定焉。光绪丁酉十月徐维则记。

又案:书内引《大一统志》、《天京事略》、《舆地要览》、《岁时风纪》,皆元人之书,今已不得见,赖此足以知大较,引《析津志》殆即熊自得《析津志典》。则又记。^①

上引徐维则跋文首先介绍了其藏本的传绪过程。此书最初为乾嘉时期的绍兴藏书家李宏信所得。宏信,字柯溪,山阴柯山人,曾任云南吏目,“生平精鉴赏,嗜藏书”,斋号“小李山房”^②。这部《析津志》抄本原首题《宪台通纪》,即出于柯溪先生手笔。盖宏信歿后,此书转归同邑孙沂小青楼,晚清光绪中又流入徐维则之手。维则之父是绍兴著名藏书家徐友兰,“性好收藏”,“凡旧抄、精

①叶1a—1b。“赵书一卷”,“一”字原为“二”,有涂改痕迹。“唐维明”,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原作“唐惟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22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②《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第二编樊镇撰《李宏信传》,民国二十六年(1937)浙江绍兴县修志委员会铅印本,第15册,叶16b。宏信纂有《小李山房书目》四卷,此书稿本今存佚不明。

刻、石墨、古今法帖、名画有所见辄购度八杉斋中”，在上海经商期间，他又“命长子维则广为搜罗，别辟精舍以藏之，名曰铸学斋、述史楼”^①，故此《析津志》抄本钤有“述史楼”印及“会稽徐氏铸学斋藏书印”^②。

紧接着，徐氏着重讨论了该书内容及其书名问题。徐维则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的跋文中，已对李宏信所书《宪台通纪》题名予以辨正，他根据全书门类设置及具体内容，断定此书绝非专记元代御史台史事的《宪台通纪》，因书中有明洪武三年记事，故疑为“明初人辑元都掌故之书”，至于究竟应该“定其为何书”，维则甚为困惑，终无结论，无奈之下，只好“依旧题曰《宪台通纪》，以俟后人考定”。其随后所记第二则跋文，虽进一步指出该书内征引诸书皆为元人著作^③，并称所引《析津志》殆即熊梦祥（字自得）《析津志典》，但似乎并未对全书性质加以认定。后来李致忠先生谈及此书基本因袭徐氏之说，不过他又指出书中含有大量《析津志》内容，遂将该书绝大多数文字记载皆录入《析津志辑佚》，俨然已将其视为《析津志》的一个独立抄本，而赵其昌先生更是明确称其为《析津志》，但二人均未详细论证，更没有深究此书之来历。此后学者引用该书史料皆径采自《析津志辑佚》，无人再关注其书之原始形态。笔者有幸在天图目验此书，故需首先澄清一下这部书的定名问题。

此书现无正式题名，但据徐维则言，其原有李宏信手题《宪台通纪》，“装修时为鼠剥去”，可见此书已经徐氏改装，失其原貌。今本二册分门别类地记述了元大都的官署布局、学校制度、岁时风纪、河闸桥梁、寺观古迹等内容。第二册首题“析津志”，下文依次有“祠祀”、“学校”、“风俗”、“岁纪”、“河闸”、“桥梁”、“古迹”七个门目，卷末为徐维则跋文，第一册则题有“古迹”和“台谏叙”两门，其中“祠祀”、“学校”及“台谏叙”下均有此三门小序^④。维则将第二册卷首所见“析津志”当作与“古迹”、“岁纪”等相同的门目来看待，实属误解。此“析津志”应为这部抄本的书名，而非某一门类之名，赵其昌先生即是据此将其认定为《析津志》的。在这一题名下所记载的皆为大都庙宇，故此处恐遗漏了“寺庙”之类的具体门目名称。至于为何“析津志”三字出现在第二册，而不见于第一册卷端，这个疑问也不难解释。上面提到，第二册记载的最后一个门类为

①《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第二编薛炳撰《徐友兰传》，叶164b。按徐维则纂有《述史楼书目》（不分卷，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未著录此书。

②徐友兰、徐维则父子两代藏书于1905年徐友兰去世后开始散出，参见钱斌、宋培基：《藏书家徐维则事迹钩述》，《文献》2008年第4期，第69—70页。

③徐氏提到的《大一统志》即《元一统志》，《舆地要览》盖即《大元混一舆地要览》，《岁时风纪》乃熊梦祥另著，然《天京事略》失考，未详何书。

④可见《析津志辑佚》，第38、59、197页。按“台谏叙”，实当为“台谏”门。

“古迹”，正好可与第一册卷首所题门目相衔接^①。据笔者推断，此书原来应是有“析津志”题名者为上册，无题名者为下册，后来可能是徐维则在改装时误将其另纸书写的跋文附于上册，以致后人产生误解，将两册顺序颠倒^②。

该抄本为《析津志》，除有卷首题名之外，我们还能找到其他证据。譬如，此书“桥梁”、“古迹”门在逐条记录大都境内的桥梁及楼台亭池等古迹时，共有七处“已上并见《析津志》”的小注，以说明其摘录条目的文献出处。“学校”门在转录元朝有关学校制度的令旨之后，有一段“臣梦祥曰”云云的史评文字^③，当即《析津志》作者熊梦祥本人的言论。此外，该书所载“台谏”门小序及御史台“创建沿革”，今见于《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七引《析津志》^④。另据笔者检核，书中各门共有多达四十一条记载均见于《钦定四库全书》所引《析津志》。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此书应当就是一部抄本《析津志》。

不过，在此还需对徐维则提到的两处疑点稍作解释。上文指出，此书载有一篇《宪台通纪序》，故李宏信曾误题为《宪台通纪》，另外书中还出现了一则改国子监为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的记事，徐氏认为这两条都不应是《析津志》的内容，故《析津志辑佚》亦未予收录。但实际上，《析津志》一书所载内容非常庞杂，如其“朝堂公宇”门即转录了众多中书省厅堂题名记^⑤，而那篇《宪台通纪序》今见于该抄本第一册“台谏叙”门之末，按理来说，《宪台通纪》作为一部重要的元代御史台典章制度汇编，《析津志》将其序文记入台谏门，似乎也不足为奇，并非没有可能。至于那条有关明初改府学的记载，赵其昌先生已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析津志》虽是熊梦祥撰成于元末，但此人较为长寿，元亡后隐居乡里，年九十馀卒^⑥，明洪武三年他还曾与告老还乡的族人熊太古参加当地的乡饮酒礼^⑦，所以这部《析津志》抄本所见明初记事很可能是熊梦祥后来增补的^⑧。由此可见，徐维则提出的两点质疑其实并不足虑，此书当为《析津志》无

①按其实，第一册“古迹”门下所记内容并非大都古迹，而是“朝堂公宇”，且为首有一篇小序叙述此门撰作之由（可见《析津志辑佚》，第8—9页），此书的校订者似乎已发觉这一错误，故在“古迹”二字题名上有墨点圈涂的痕迹。

②由于这部《析津志》抄本早已“首尾不完”，多有残缺，所以也不排除李宏信最初收藏此书时已误将两册倒置的可能。

③可见《析津志辑佚》，第200—201页。

④《永乐大典》卷二六〇七“皆”字韵“台”字目引《析津志》，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1279页。

⑤可见《析津志辑佚》，第8—37页。此部分内容见于天图藏《析津志》抄本第一册原题“古迹”门下。

⑥何士锦修、陆履敬等纂：《（康熙）丰城县志》卷九《人物传》“熊自得”条，清康熙三年刻本，叶50a。

⑦胡俨：《胡祭酒集》卷一三《题熊自得画》，《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隆庆四年李迁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2册，第117页。

⑧参见赵其昌：《（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第66—67页。

疑。

然而上文说到,熊梦祥《析津志》早在明中期以后即已亡佚,那么清代怎么会重现一部《析津志》抄本呢?清高宗标榜文治,稽古右文,于全国上下大力搜求遗书,纂修《四库全书》,其中一个重要的文献来源就是从《永乐大典》内辑出佚书。据学者研究,《大典》的辑佚工作大概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馆正式开馆之前便已启动,馆臣先将《大典》原本分派给纂修官逐册阅读,签出应辑之书目,然后再交由誊录官抄录,缮写底本,这一工作至三十九年即已基本完成,当时签出的佚书总数约有1135种之多。这些佚书还要经纂修官详细

校正后拟定为“应刊、应抄、应删三项”^①,上报总裁官审定,但最后真正能够为《四库全书》所著录者仅有516种^②。换言之,《大典》辑佚书有一多半终被舍弃,未能收入《四库全书》。其实,本文所论天图藏《析津志》就是这样一部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大典》辑佚稿本。

之所以判定此《析津志》抄本乃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主要有如下几条理由。第一,校签。此书之内今有黏签七条,其内容皆为校正抄本文字之误,其中有的签条明确说明系核查“《永乐大典》原本”^③。如第一册旧题“古迹”(按实为朝堂公宇)门“诸卫”条校签谓“查《永乐大典》原本,诸卫俱列入枢密仪门之内”,第二册“古迹”门“门殿记”条亦有签称“查《大典》原本,门殿记即附入古迹门内,未另标题”云云(见图2)。这些黏签透露出书中内容即源自《大典》,故需依照原本校验。李致忠先生也据此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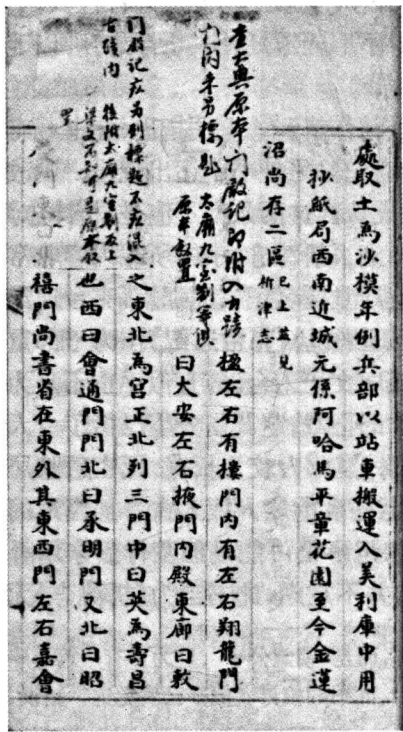


图2 《析津志》抄本校签

“此书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第二,“已上并见《析津志》”之注文。上文提到,此书第二册“桥梁”、“古迹”门内共有七处“已上并见《析津志》”的小注。这些文字略显奇怪,既然该书

①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②参见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36页;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140页;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77页。

③徐维则跋文已指出此书“内有签校《大典》数条”。

卷首已总题“析津志”，为何又出现这样的注文呢？实际上，这恰恰是直接逐录《永乐大典》原文的证据。清人曾将《大典》“天”字韵“顺天府”条所收内容专门辑录出来，题为《顺天府志》，此辑本现有两种：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清雍正间抄本残帙两卷，系辑自《大典》卷四六五〇至四六五一^①；二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缪荃孙《大典》辑本八卷^②。据其二者所见，《大典》“顺天府”条目下有不少征引《析津志》的内容，且多有“已上并见《析津志》”小注以标识史料出处（见图3、4），而四库馆臣辑《析津志》又将这类注文从《大典》中照原样抄出，从而产生了上述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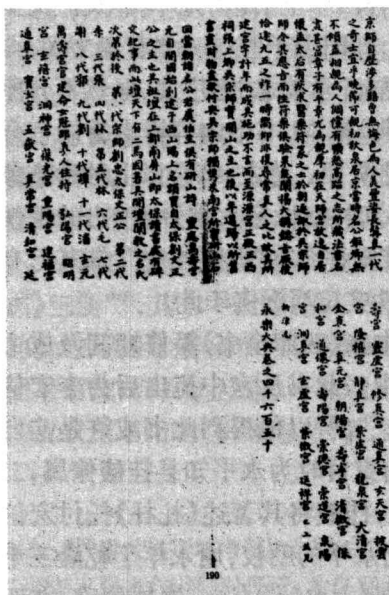


图3 国家图书馆藏《顺天府志》
《大典》辑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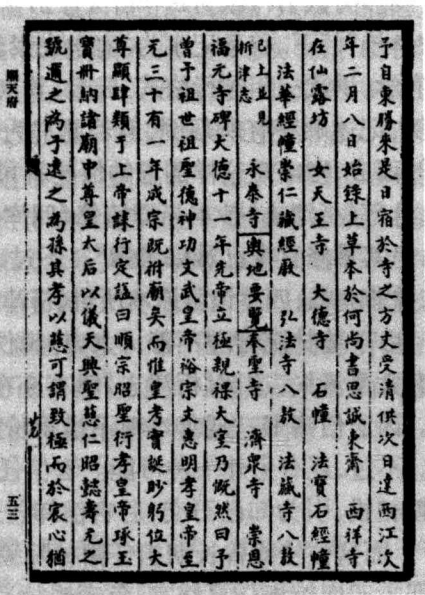


图4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辑
《顺天府志》书影

第三，书中涂改痕迹。据笔者所见，此书内有不少涂乙圈改的文字。例如，第一册朝堂公字志序称“翰林国史官”，“国”字下原衍一“国”字，被删去；《中书省左司题名记》“司各置郎一人”，“郎”原误作“廊”，遂圈改；《殿中司马祖常题名记》“监察御史今廿人”，“廿人”，原作“廿七人”，涂去“七”字；《中书省六政条要题名记》下“在架阁库内”五字，有勾选批注曰“小注单行”。第二册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刘文中旧市题记一篇，内有“予嘉其用”句，“其用”二字原作“用其”，有乙正符号^③。这些涂改痕迹说明此书抄成后经过了仔细的校阅，从

①关于此本详情，参见孙殿起著、雷梦水整理：《庚午南游记》，《文物》1962年第9期，第39页。此书今已影印出版，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86册。

②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顺天府志》，1983年。

③以上几处可参见《析津志辑佚》，第9、12、20、42、58页。

其严谨程度及其操作规范来看,它与四库馆臣所办《大典》辑佚稿本十分接近。《大典》中的散篇佚书从各卷被签出誊录后,首先要由纂修官对这些零散文字进行校勘整理,粘连成册,编为初辑稿本,其特点是各条记事后均有详细的《大典》出处,标明卷数页码;然后按四库全书的办理格式抄定,发原纂修官校正,形成二次修改稿本,一般此本文字改动较多;随后再抄录一遍,校勘无误后誊录为定本^①。今观天图藏《析津志》抄本,其各条内容记载并未详载《大典》出处,而文字涂改又较为普遍,故笔者推测,此书很可能就是辑自《大典》的修改稿本。

此外,该书行款为每半叶8行21字,符合四库全书馆的抄写样式。又第二册“学校”门下,首条记事为“府学在崇教坊,即旧国子监……北有崇文阁,今改为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云云,其次才是此“学校志”之序文,显然不合原书体例,记述顺序有所颠倒,但若此书为《大典》辑本,书中内容皆由誊录官分条摘抄而成,则出现这样倒置的情况就司空见惯了。总之,综合以上种种迹象来看,这部《析津志》抄本当即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辑佚稿本,但其纂修官今已难以考索^②。不过,徐维则称今本“首尾不完”,知其已有残缺,并非完帙,四库馆臣原本所辑《析津志》佚文定当远多于此。

由于翰林院管理不善,《大典》辑佚稿本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及成书后均有大量流失,这部《析津志》辑本亦在其中。此书从宫中流出后为李宏信所获。因宏信嗜书,“遇善本辄不惜重价购之”^③,所以他得到此书或许是购自厂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宏信任云南吏目时为永平知县桂馥僚属,二人性趣相投,引为知己石交,后宏信卸任返浙,桂馥将其著述《札朴》托付宏信刻印^④。而这位桂馥曾长期担任翰林院编修周永年的助校,周永年于乾隆三十八年即入四库馆担任纂修官,负责辑校过多部《大典》佚书^⑤。据桂馥称,在四库馆期间,永年“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⑥。知周永年常借职务之便,私自将四库馆书携归,命桂馥参阅群书撰作《四部考》,在这过程中,想必有不少书籍

①参见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第160—164页。

②史广超博士将此书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未收或未题‘永乐大典本’书目”,并称“此书或即为其时流传之四库馆中未成辑本”(见《〈永乐大典〉辑佚述稿》附录,第308页)。按其实际《析津志》当时已有修改稿本,并非“未成辑本”。

③《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第二编樊镇撰《李宏信传》,叶16b。

④桂馥《札朴》书后李宏信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癸酉小李山房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56册,第221页。关于桂馥生平,可参见孙雅芬:《桂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8页。

⑤参见史广超:《〈永乐大典〉辑佚述稿》,第114—119页;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第263页。

⑥桂馥:《晚学集》卷七《周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清道光二十一年孔宪彝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9册,第585页。

未能交回馆中,以致流落散失,故这部《析津志》辑佚稿本也不排除周永年携出宫外,后经桂馥流入李宏信之手的可能。

这部《析津志》辑本经李宏信、孙沂、徐维则三代绍兴藏书家,最终入藏天津图书馆,但笔者怀疑今国家图书馆可能还保存有赵万里先生的一个复制本。1964年,宿白先生《居庸关过街塔考稿》一文提到“北京某氏藏抄本《析津志》”,据其描述可知,即徐维则铸学斋藏本^①。后来,徐莘芳先生《元大都也可温十字寺考》又谓“赵万里先生藏的徐维则铸学斋藏山阴李宏信小李山房旧藏的《永乐大典·顺天府》两卷”云云^②,所指亦为徐维则铸学斋之《析津志》抄本。徐莘芳先生虽误将其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清雍正间题名为《顺天府志》的《大典》辑本二卷相混淆,故误称为《永乐大典·顺天府》,但他明确指出此本为赵万里先生所有,当即宿白先生所谓“北京某氏”。因赵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期间十分关注《析津志》一书,不仅从《大典》残本中直接辑录《析津志》,而且还有做《析津志》校注的计划。笔者怀疑赵万里先生可能早已认识到旧题《宪台通纪》的天图藏徐维则铸学斋抄本即《析津志》,遂将全书影印或抄录,以备整理。今编《赵万里文集》所附“赵万里主持《永乐大典》辑佚成果简目”列有“《析津志》三册”^③,其中一册当指北平图书馆所辑《大典》稿本,另二册或即赵氏复制的徐维则铸学斋藏本^④。《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所说的北京图书馆藏两种《析津志》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⑤。此外,赵其昌先生所谓首博借抄北京图书馆之《析津志》二册,或许指的也是赵万里先生藏本。

①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第4期,第13—14页。宿白先生因此书内容恰为缪荃孙辑本《析津志》所无,故怀疑其为辑自《大典》卷四六四×至卷四六四九“顺天府”条的过录本。按此说恐不确,此书实乃四库馆臣专辑《析津志》之书,其摘录范围并不限于“顺天府”条,如书中所见“台谏叙”即出自《大典》卷二六〇七“皆”字韵“台”字目。

②徐莘芳:《元大都也可温十字寺考》,《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15页注6。同氏《元大都枢密院址考》一文亦有提及(《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54页注1)。

③《赵万里文集》第3卷附录“赵万里主持《永乐大典》辑佚成果简目”,第573页。

④赵芳瑛、赵深编《赵万里先生传略》谓1955年赵万里五十岁,“12月,作《元代史料四种校辑记》,载是年《文物参考资料》。文中介绍了他正在进行的《经世大典》、《析津志》、《南海志》和《元一统志》校注工作,以及出版计划”(第17页)。此处提到的《元代史料四种校辑记》是赵万里先生《永乐大典》辑佚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其中定然会对其整理《析津志》的过程及资料搜集、版本收藏情况有详细介绍,但吊诡的是,笔者翻阅了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历期《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以后改名为《文物》),却均未见此文,且今所编《赵万里文集》亦未收录,可见其编者最终也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甚为遗憾。

⑤据称,赵万里先生有关《永乐大典》辑佚的成果初稿大部分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地库中存放着,不能为学界所用(见张志清:《赵万里与〈永乐大典〉》,《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10日第5版)。这其中也许就包括赵氏所搜集的《析津志》。

三、《析津志》抄本与《钦定日下旧闻考》之编纂

以上辨明了天图藏《析津志》抄本系清四库馆臣《永乐大典》辑佚稿本,其文献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此外,笔者还注意到,该书在四库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其实并不止于此,这部稿本实与清高宗敕修《钦定日下旧闻考》(以下简称《日下旧闻考》)关系密切,透过此书,我们可以进而了解《日下旧闻考》编纂的某些侧面。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开馆,六月清高宗发上谕,命于敏中等乘“方今汇辑《四库全书》,典籍大备”之机,在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的基础上,考证核实,“订讹衷是”,拾遗补阙,编为《日下旧闻考》,“书成并即录入《四库全书》,以垂永久”^①。《日下旧闻考》于乾隆四十七年末告成,次年进呈御览,此后续有增删修改,五十六年由武英殿刊行,是清代官修规模最大、内容最为详实的北京史志文献^②。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搜罗洪富,汇集了近两千种有关北京历史的典籍文献及碑铭石刻资料,其中不乏如《元一统志》、《经世大典》、洪武《北平图经》等早已不存的佚书^③,这想必得益于当时修《四库全书》,“典籍大备”,且可直接参阅大内所藏《永乐大典》。

其实,在《日下旧闻考》最初的编纂凡例中,即已明确要求纂修官充分利用四库馆搜集之书。于敏中被任命为《日下旧闻考》总裁官之后,立即去函请四库总纂官陆锡熊助其“发凡起例”^④,不久陆锡熊便将凡例拟定,深得于氏赞赏,并在实际编纂工作中遵照执行^⑤。陆锡熊所拟“《日下旧闻考》凡例”,今保存于氏著《宝奎堂余集》,其中第十四条云:

一原本征引书籍极博,而如《元一统志》、《经世大典》之类亦多所未见,今乘此群籍大备之时,似可于馆中各书内留心检阅,遇有关系京都典故,即为录出补入,勒成完本,实为盛事。至现在四库馆内送到书内,如孙承泽《天府广记》等部尚多,皆足以资参考,似可暂借付局考证,再行交还,

①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档案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7册,第399页。

②参见苗润博:《〈日下旧闻考〉纂修考——兼谈新发现的四库稿本》,《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第237—265页。

③参见吴元真:《〈日下旧闻考〉一书的编刻时间及其历史价值》,《文献》1992年第3期,第205页。

④见《于文襄手札》第9函(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及第13函(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3年。

⑤苗润博:《〈日下旧闻考〉纂修考——兼谈新发现的四库稿本》,第240页。

于事更为有益。^①

此条凡例指出朱彝尊《日下旧闻》虽引征广博,惜未能参见《元一统志》、《经世大典》等书,而今“群籍大备”,遂令纂修官一方面留心检阅四库馆中各书,凡有关京都典故之史料即行抄出,以备采择;另一方面,如馆内所获孙承泽《天府广记》等北京史志,则可“暂借付局考证,再行交还”。此处“局”乃指四库馆下设“纂修日下旧闻处”^②。据陆锡熊凡例可知,当时允许借四库馆书以资参考。

在四部群籍之中,所谓“有关系京都典故”者必首推元熊梦祥《析津志》,而此书又恰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内辑出,故修《日下旧闻考》利用此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今检《日下旧闻考》,凡引及《析津志》内容者达一百三十余条之多,其中既有各卷诸条目“增”字下直接征引原文者(此系纂修官新增内容)^③,亦有馆臣按语转述者。又《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门序有馆臣按语云:“兹采摭记载及《永乐大典》内之《析津志》、《元一统志》、《北平图经》志书,增其缺佚,并为条分品目。”^④由此可见,纂修《日下旧闻考》时确实对《析津志》一书多有取资。而本文所讨论的天图藏《析津志》辑佚稿本残卷,很可能就是《日下旧闻考》纂修官曾参阅过的一个本子。

首先,从内容来看,天图藏《析津志》辑本残卷至少有四十一条记载均见于《日下旧闻考》征引,占《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总条目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大多数内容两者所记文字基本相同^⑤,有的则可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因袭关系,兹举一典型例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六《风俗一》朱彝尊原引《辽志》:“南京,水甘土厚,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其下“增”字条云:“燕俗详载赵洪江先生文集,俗尚勇力而敢敌有为(小注:《舆地志》)。”^⑥此

①陆锡熊:《宝奎堂徐集》“谨拟《日下旧闻考》凡例”,《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5册,第351—352页。按此书原误题为陆费墀《颐斋文稿》,参见苗润博:《国家图书馆藏“陆费墀〈颐斋文稿〉”考辨——兼论陆锡熊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第115—120页。

②此局署名见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户部为纂修日下旧闻处查明各衙门情况事致典籍厅移会》,《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18页。

③《日下旧闻考·凡例》云:“凡朱彝尊原引则加一‘原’字于上,朱昆田补遗者则加一‘补’字于上,其新行添入者则加一‘增’字于上,逐条标识,以期一目了然。”(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④《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九《物产一·序》,第2370页。

⑤如《日下旧闻考》卷一五五《存疑一》“杜康庙在旧城北”条“增”字下云:“杜康庙在旧城光禄寺内居西偏,内有天师宫,奉礼部标拨道士一人在内提点看经,专一焚修香火,盖为酤造御酒,每日于上位玉押槽内支酒一瓶以供杜康,提点者自行收贮(《析津志》)。”(第2497页)《析津志》抄本全同。《日下旧闻考》卷三二《宫室·元三》“至正十三年正月重建穆清阁”条谓“臣等谨按……《析津志》:至正年间,新盖穆清阁,与大安相对。”(第483页)《析津志》抄本作“至正年间,今上新盖穆清阁,与大安相对”。兹不赘举。

⑥《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六《风俗一》,第2330页。

条并未标明出自《析津志》，然据笔者检核，《析津志》辑本有如下这条记载：“右燕，志云‘水甘土厚，人多艺秀者’，古今一大都会，其详载于赵洪江先生文集，尚勇力而敢敌者有为（小注：出《舆地志》）。”按《析津志》此条记燕京风俗谓“志云‘水甘土厚，人多艺秀者’”，与朱彝尊引《辽志》同源，皆指《契丹国志》；^①下引《舆地志》称“其详载于赵洪江先生文集”云云，盖指南朝顾野王所撰《舆地志》，^②此书宋元以后即已失传，清人无缘得见。观《日下旧闻考》所引《舆地志》文字内容与《析津志》辑本大体一致，可知四库馆臣所增补的这条记载必取自《析津志》无疑，由此可见《析津志》辑本与《日下旧闻考》相关内容的渊源关系。

其次，从天图藏《析津志》辑本的黏签中，我们也可看出一些端倪。上文提到，此书中今见七条校正抄写之误的黏签，其中有两组校签系不同级别的馆臣就某一问题的相互应答。《析津志》辑本“古迹”门内有“门殿记”及“太庙上梁文”、“大次殿上梁文”、“刘致太室次议”诸篇，并有签条云：“门殿记应另列标题，不应混入古迹内。后附太庙九室制及上梁文，不知可是原本叙置？”另有一签答曰：“查《大典》原本，门殿记即附入古迹门内，未另标题，太庙九室制等俱原本叙置。”意谓《大典》所见《析津志》即以“门殿记”入古迹门，此后有关太庙制度的几篇文字次序亦遵原样。又刘致《太室次议》文中有“遂以旧庙八室而为六室”句，大概是有馆臣认为此处“遂”字有误，故题签云：“查原本系遂字，应是原本之讹。”后另有签称：“查抄本，系照原本缮写，今遵签改正，应是原本之讹。”^③说明题写后签者已遵前签核查了《大典》所引《析津志》原文。有学者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日下旧闻考》纂修稿本做过专门研究，发现其中多有纂修官针对总裁、总纂官修改批注的回应文字^④。两相比较，其实见于《析津志》辑本的这些应答校签与《日下旧闻考》稿本中的馆臣批注是十分类似的。按理说，既然《析津志》并不收入《四库全书》，那么四库馆臣本毋需对此书进行如此细致的校勘覆核，但事实情况却与此相反。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纂修《日下旧闻考》需着重参考《析津志》，故对此书做了仔细的校核工作。以上所见校签有可能就出自《日下旧闻考》总纂官及纂修官之手。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天图藏《析津志》辑佚稿本很可能就是专为纂修《日下旧闻考》而誊抄精校的一个本子，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这一《析津志》抄本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日下旧闻考》纂修过

①旧题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州县载记·四京本末》“南京”条，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中华书局，2014年，第242页。按此条记载史源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析津志》引文误作“人多艺秀”。

②其所称“赵洪江先生”今已难以考索。

③据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一五刘致《太庙室次议》，此句“遂以旧庙八室而为六室”（《四部丛刊》本，叶15b）无误。按《析津志》辑本正文“遂”字并无修改痕迹，所谓“今遵签改正”盖敷衍而已。

④苗润博：《〈日下旧闻考〉纂修考——兼谈新发现的四库稿本》，第257页。

程中的某些细节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本。笔者认为,此书对于《日下旧闻考》编纂及相关四库学问题的研究或可有以下三点助益。其一,此前学者对《日下旧闻考》所参阅书籍的整理情况关注不多,而《析津志》的例子则提示我们,当时四库馆臣应对有关北京历史的文献做过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充分利用了《永乐大典》的辑佚成果,对佚书精加校勘,除《析津志》外,如洪武《北平图经》等书可能也有类似的《大典》辑佚稿本。其二,从《析津志》辑本来看,全书仅有文字勘误校正,此外既无内容删改,亦未改译民族语名,实际上这些工作是在《日下旧闻考》稿本上进行的,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四库馆臣讳改工作的一些具体流程。其三,弄清《析津志》与《日下旧闻考》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容易理解《析津志》这样一部重要典籍既已从《永乐大典》内辑出,却为何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未列入存目。《日下旧闻考》修成后,得到了清高宗的赞誉,《四库提要》更是夸耀称:“古来志都京者,前莫善于《三辅黄图》,后莫善于《长安志》,彝尊原本搜罗详洽,已驾二书之上,今仰承睿鉴,为之正讹补漏,又驾彝尊原本而上之,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①大概在四库馆臣看来,《日下旧闻考》已充分吸收了《析津志》等北京史志文献,可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堪称千古舆图之“准绳”,所以《析津志》等书自然也就不必收录了。

四、余论:《析津志辑佚》辨误

上文主要从文献源流及四库学的角度,对天图藏《析津志》抄本进行了深入考察。而在史料价值方面,因其内容记载几乎已为《析津志辑佚》全部转录,故无太多可发之覆。不过,还是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析津志》抄本中还是有三条记载未被今《析津志辑佚》收录。其中两条就是上文提到的《宪台通纪》序文及改国子监为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之记事^②。另有一条见于《析津志》抄本“岁纪”门:“七月,宫庭七夕日风纪,见于《岁时风纪》内。”可能是由于此条记载甚为简略,其详所见之熊梦祥《岁时风纪》早已佚失,故《析津志辑佚》的整理者未收录此条。

第二,《析津志辑佚》有两段记载标明出自徐维则铸学斋藏《析津志》,但其实并不见于该书。这分别是《析津志辑佚》“祠庙、仪祭”门中的“原庙、行香”及“郊祀神位”两部分内容,前者注明引自“徐氏铸学斋抄本《析津志》”及《大典》卷一七〇八五“庙”字韵第六页上;后者标注出处为《大典》卷一五一四〇第二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二四《钦定日下旧闻考》提要,中华书局,2008年,第603页。

②此条记事原文:“府学在崇教坊,即旧国子监。元至大元年建。中曰明伦堂,东西二厅曰崇术,曰立教。两廊列为八斋,斋前树立元延祐元年至至正二十三年登科进士题名碑记。北有崇文阁,今改为府学。洪武三年颁行格式,刊立碑石,永为遵守。本府额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生员四十名,其分科教习及廩膳升黜俱有条目,每岁正月十日望日,本府官率僚属耆宿并师生行乡饮酒礼。其所属各州设教官,训导各一员,生员州三十名,县二十名,依上训诲作养以备擢用。”

頁下“队”字韵引《析津志》，同时又称“以上俱引自徐氏铸学斋抄本《析津志》”^①。实际上，这两段应当都来自《大典》，而为徐维则铸学斋藏《析津志》抄本所无，《析津志辑佚》标注有误。

第三，检核《析津志》抄本，可校正《析津志辑佚》若干文字讹误。譬如，“中书参议府题名记”谓“中统元年，置中书省”，“省”《辑佚》误作“府”；学校门载蒙古宪宗四年甲寅（1254）七月令旨见“使臣习刺必阁赤”，“刺”《辑佚》误作“勅”；祠祀门记山川祀典，有“雨旱穰穰，不无祷焉”，“不无”《辑佚》倒作“无不”；古迹门有记金中都城制者，称“西出玉华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于是”，其中“杏”字原本残缺，《辑佚》依字形残画释作“各”，但据笔者目验，实当为“杏”^②。《析津志辑佚》诸如此类讹误尚多，兹不赘举。

第四，《析津志辑佚》对《析津志》抄本原条目所属之门类有所改动。这主要出现在《析津志》抄本“岁纪”门中，此门较为完整地记述了从立春至十二月元大都宫廷内岁时风纪的情况，但《析津志辑佚》却将自“立春”直至“六月进肴蔬菓”条的大段记载（除“元宵”条外），全部移置于“风俗”门，^③致使今“岁纪”门内容残缺不全。另外，上文指出，《析津志》抄本“古迹”门末附有“太庙上梁文”、“大次殿上梁文”及“刘致太室次议”三篇文字，据四库馆臣校签可知，此乃《大典》“原本叙置”，而《析津志辑佚》却将其另题为“太庙”门^④，亦有失妥当。这恐怕都是《辑佚》整理者未审《析津志》原书体例而造成的^⑤。

从以上这些问题来看，天图藏抄本《析津志》在文献校勘方面仍有一定价值，希望引起金元史及北京史研究者的注意。

【作者简介】邱靖嘉，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宋辽金史。

①《析津志辑佚》，第63—64、66页。

②《析津志辑佚》，第11、200、59、113页。

③《析津志辑佚》，第202—204页。

④《析津志辑佚》，第49页。

⑤又《析津志》抄本“古迹”门记云：“金朝筑燕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至燕传递。空筐出，寔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析津志辑佚》亦收有此条，见于“城池街市”门，但其所标注的出处为“《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京城总纪》引《析津志》”（第1页）。